

溟南文丛



新编东坡海外集

林冠群 编注

海南出版社

海南文丛

新编东坡海外集

林冠群 编注

海南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启忠
封面设计 蔡于良

新编东坡海外集

林冠群编注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1/32 16印张 330千字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590-301-8/Z·12

定价: 8.20元



作者简介

林冠群，海南省儋县中和镇人，1943年生。现任海南日报社办公室主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1980年参加全国苏轼研究会，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苏轼研究论文二十多篇，并著有四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在海南》，由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完成。已出版《欧阳修诗文选择》（与周济夫合作），发表各类作品200多篇（首），杂文、散文、论文等曾在全国与省级评奖中多次获奖。

《当代中国中青年学者辞典》，《中国文艺家传集》（第二部）有传。

内容简介

这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所有著作的编年全集。集中有诗、词、文、赋、书信等各种体裁作品两百多篇，全面深刻反映了晚年苏轼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文学主张以及生活态度。通过这些作品，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北宋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侧面，加深对王安石变法之后政治局势的理解，也可以了解宋时号称“海外蛮荒”的海南岛的部分历史情况，是研究古代海南岛的珍贵史料。同时，集中诗文处处流露出苏公主张“汉黎一家”，倡导民族团结的进步观点，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第一人。所以本书是研究苏东坡晚年学术创作、正确评价东坡其人的重要原始资料。

本书以旧《海外集》《居僇录》为基础，辨别真伪，考订年月，增补遗佚，尽可能完备地收录了苏东坡谪居海外三年的作品，并首次对这些作品加以详注，是阅读和研究的好版本。

主编：李启忠

编委：林冠群 周济夫

周伟民 李启忠

苏英博 蔡云山

蔡于良 叶 枫

唐玲玲



溟南文丛目录

- 溟南历代诗选
- 历代名人入琼诗选
- 新编东坡海外集
- 苏轼谪琼诗选注
- 王佐诗选
- 邱浚诗文选
- 海瑞文论选

关于《新编东坡海外集》

（代前言）

《海外集》是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期间各体文章的结集。历来认为，海外三年是这位豪放派大师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风格也有新的发展。王文浩认为东坡的诗风“熙宁还朝一变，倅杭守密正其纵笔时也。及入徐、湖，渐改轍矣。元丰谪黄一变，至元祐召还又改轍矣。绍圣谪惠州一变，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王氏的“全入化境”论，肯定东坡海外三年诗歌创作的成就，这可以找到一个很有力的佐证。那就是南宋崇宁、大观间，社会上曾掀起过一股“苏诗热”。朱弁《风月堂诗话》称：“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类。”（引自《苏诗总案·杂缀》）。即使这股“苏诗热”当时或许还掺杂着其他的社会因素，但据以说明社会上对东坡晚年诗的赞赏，並不失真。而东坡本人对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至少有两点很自负。其一是对他的和陶诗。他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的“创举”，而且就质量言，“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再就是他的《书传》（即海外论，又称《志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

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东坡素以“器识闳伟”著称，为人又很谦恭，如此自我评价，是否公允，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由于过去对东坡晚期作品介绍甚少，因此这无疑又是见识东坡作品和思想的一个新的园地。下面仅就这个集子的有关情况作个简单的评介。

公元一〇九七年（北宋哲宗绍圣四年）五月，苏东坡离开了谪居三年的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其时诗人已经六十二岁，经多方筹措，惨淡经营，刚刚筑成白鹤新居，大江横户外，房屋二十间，儿孙之中，除次子苏迨一房外，全部齐集膝下，正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岂料“使命远临，初闻丧胆”，一声霹雳，诗人竟被再贬至孤悬海外的琼州！

这一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且看东坡临别时给王敏仲的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看来，东坡已经意识到，以垂暮之年，再迁海外，无异于走向死地。

然而，事实证明，真正的畏途并非海南的地理生活环境。海外地方千里，环海四州郡，历届守土之官不都照样生活得很好吗？土人虽顽鄙，但风俗淳朴，汉唐以来，汉黎杂居，渐归王化，寿百余岁者并不少见，何畏之有？真正可怕的是“宦海恶，人情薄”，一把无形的利剑来自天子身边操

生杀大权的宰执手中，随时可以夺人性命。

因此，《海外集》中所展现的海外风物具有两重性。

“考《图经》止曰海隅，问风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无御冬”；“土人顿顿食蒔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魍魎，出怒入娱”；“病无药，居无室”……这确是一幅令人望而生畏的“蛮烟瘴海图”，想象之下，谁敢在此驻足？但是，你可以注意到，这样的描绘有时只出现在东坡给皇帝的“谢表”里，目的是要争取他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要蒙住那些政敌的眼睛。有时也出现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表现的是初到海南时的“苦况”，以后便渐见稀少。更多的则是充满诗意的语言，并不能完全当作现实看。

另一方面的描绘则是，海南“无甚瘴也”，“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垂天紫霓云端下，快意风从海上来”……自然景观奇诡迷人，山川原野足供浏览。又“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贻吾”，“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与居人邻里之间如此相得友善，海南还是住得下的。还有玉糝羹之美，酒子之醇，瀛天门冬酒之乐，直至食蚝之味，妙不可言，特密而不宣，“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滴海南，分我此美也”。这些虽属戏言，却有真趣，反映的是诗人随遇而安的心境，也露出了风物淳美的底蕴，并不象另一种场合下所描绘的那么可怕。再进而推及物产、气候、民俗等等，就简直是向你展示饶有文学趣味的风物志了。

唯有那紧追不舍的政治迫害时时给诗人的心蒙上一层阴影。这阴影是那样的浓重，简直使他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虽已滴居海外，虽被逼到连栖身之所也没有，他也一再忍让，“不欲与官员相交涉”。一贯豁达开朗，敢于直言的胸襟，在重压之下，似乎也有某些改变，时时虑及后果，留心影响了。结果是，诗的风格也因此产生某些变化：“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不这样看，就不好理解一些看似晦涩难懂的诗篇。当然也不能都这样看，否则可就把这位豪放派的鼻祖看扁了。

东坡对付政治迫害，历来有他独特的抗争方式。在朝时，可以要求外放；被贬时，可以潜心参禅学道，服食养性。“丈夫贵出世，功名岂人杰”，这是第一招。他特意绘出鲁仲连、安期生之流，把他们塑造成自己理想的“得道”人物，即既能匡时济世，排难解纷，又能功成身退，弃名利如敝屣。这样的超人“模式”显然可以纳入象他似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因而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与安慰。其次，在身陷逆境时，往往以一种超然自适的姿态来对待眼前的不幸。这又是一招。“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整个《海外集》没有消沉绝望的哀叹，而是借助于佛、道，自许另一种新生，又以佛道的达观去观照内心与自然，因而取得相当和谐的现实矛盾与艺术矛盾的统一。象《乳泉赋》以及类似的描写艰苦环境的作品，往往在“却五味以谢六尘，悟一真而失百非”的顿悟下泯却了生活的艰难本质，浮现出陶渊明式的理想光辉。因而也从精神上瓦解了那一历史时期政治迫害的燎人毒焰。

还有，进行不屈的韧性战斗，也是东坡反迫害的抗争方式。集中除了《和陶杂诗十一首》之十，《论商鞅》等直接讽刺王安石“经术治国”的政治主张以外，随时借题发挥，

隐喻暗讽，连章惇、董必等也不放过，甚至连皇帝也给影射到了（广利王不分清红皂白，听了螯相公的谗言便下逐客令）。“奏赋病未能，草玄老更疏”，这是明显的不合作的态度，“犹当拒扬墨，稍欲惩荆舒”，这是坚守节操，始终不屈的宣言，而比这更为迂回隐蔽的进攻，则比比皆是。但是，为了维护“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王文浩、纪昀等人却多方回护，有的甚至把“荆舒”当作海南人解，不惜歪曲诗意，以保存他们心目中一个腐儒的形象。殊不知这样一来，更显现了《海外集》中处处包藏着机锋。

虽然东坡塑造了鲁仲连这样的“得道者”形象，但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理想化的人物代替不了他寻求解脱时所依附的世俗的佛道思想。因为严酷的现实有时弄得他很迷惘，许许多多的人生之谜，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也会象他同时代的许多普通人一样，坠入一种不可理喻的迷信当中。集子里不但有《处子再生》《书金刚经报》《学龟息法》这类近乎传奇的迷信故事，还有不少直接阐述佛道经义的篇章。而《十八大阿罗汉颂》更是充满了曾被郭沫若讥为“撷拾佛老牙慧玄”的“说法”文字。尽管也不能简单地把这类作品看作是“拾牙慧”之作，但在文集中并不属于积极进步的东西，则是不必讳言的。只是，它却使我们看到诗人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使我们更真实地认识到一个历史的巨人。

假如我们能考虑到历史的局限，注意到东坡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实际经历，作为一个文学大家，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中许多闪光的东西，并且直到晚年，仍不减其光彩。

让我们看看他的“海外论”，也即《书传》。这是他十分看重的理论著作。除了向弟弟子由断言，对于这些议论，后世必有能理解他的人以外，又曾多次向朋友提及：“《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与郑靖老》）“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

《易传》与《论语说》是早年所作，海外完成《书传》十三卷，共十六篇“论”。概括起来，十六篇“论”谈到了五个重大的政治主题：（一）主张行仁政；（二）反对秦国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暴政；（三）治国者必须以德服众，善于笼络人才；（四）反对封建割据，主张顺应“时势”，加强中央集权；（五）反对轻起边畔，恃勇好战。比起早年在朝时的种种策论奏议来，这十六论显得较为迂阔、空泛，离不开正统儒家的政治观点。可是十六论中真正精采的不是这些堂皇的论点，而是包藏在其中的十分透辟尖新的独到见解。如唐代安史之乱，后世论者多认为唐玄宗黯于识人，没有听从张九龄的话，先除掉安禄山，“不杀以启乱”（《论管仲》）。但东坡指出，这实际上是“以成败为是非”。没有从“安史之乱”的背后看出导致这场战乱的本质问题。如果唐玄宗晚年不沉缅于声色，不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等群小，再有几个安禄山也找不到谋反作乱的可乘之机。“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无致乱之道耳。”假如不作绝对化的理解，这倒不失为治世名言。又《论养士》一文，指责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只相信严刑峻法，不信用天下之智，让

六国的人才散没蒿莱之间。此无异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且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东坡显然为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如此立论，但“任法不任人”之弊，扩而充之，足可以为万世戒。法是人制订的，法也要依赖人去执行，忽视人的作用，以为有法便可驾御一切，并不见得明智。这实际上也影射王安石变法，因为此时，新法已经推行了二十余年，天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弊，其原因就是吏治跟不上，所任非人，猾吏恃法以侵民。

此外，如论武王伐纣虽以仁义取天下，但非“圣人之举”；为避强敌而迁都必导致亡国等观点，确如苏辙所言：多先儒之所未达。

东坡以一个文学大家的形象耸立在历史的旷野之上。但前人对他的推崇和爱慕，并不仅止于文章，而首先是他的气节、道德和人品。晚年流落海外，“时穷节乃现”，使他节操和品德的光辉烛照世人，赢得更广泛的尊敬，他身处蛮荒，“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而对于祸国害民之举，虽出于亲朋故旧，也毫不客气地加以谴责。王文诰认为这是“其情性天成”，所以在惠州时有《荔枝叹》；在海南则有“贪夫污吏，鹰鸷狼食”，“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之句，有《唐允从论青苗》之篇。其余劝农耕植，授民医药，倡改陋俗，敷扬文教……凡有益于人民之事，他都勉力而为，至老不衰。所以一部《海外集》，后人，特别是谪居地人民，是当作“圣贤遗迹”来珍重的。“俾后之人得以景仰流风余韵，百世下犹想见蛮烟瘴疠之乡，当日其事其人之有如是者，以是知公之大有道于是邦也。”（刘凤辉《居僊录》序）想来，每一个編集者都有必要提到这一点。

二

然而，海南岛作为为封建统治者流放罪臣的穷荒之地，自宋以前，并不止东坡一人，其中著名的就有“五公”：李德裕、李光、李纲、胡铨、赵鼎。为什么独东坡具有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呢？这又不得不谈到他的文。《海外集》是东坡四十余年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创作风格获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他一生唯一景仰的陶渊明式的“平淡”风格在这期间有突出的表现，成了后世评论家争论不休的话题。他晚年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就是有意追求平淡风格的标志。但因为是追和次韵，却容易给人以“模仿”之嫌。只会模仿是创作中没出息的表现，历来为有识者所轻，东坡自己也曾说过：“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可见他也是反对模仿的。为什么到了自己已经进入艺术创造的成熟期以后，反而去“模仿”呢？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东坡的和陶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大而能化”的艺术追求，是他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术艺主张的实践。

东坡的创作风格属于“豪放”，这是普遍承认的观点。但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他决不会固守一种表现方法，他必然要求突破，要求创新，为避免重复自己而作不懈的努力，因而在总体风格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大作家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采。如杜甫的沉郁当中可见出绮丽、宏放、雄浑之作，李白的清新明丽中也有沉实、飘逸、雄奇之作。相反的，没有丰富的艺术风采，就很难成为一个包容万汇的文学巨匠。东坡显然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领悟到两点：第一，

作家随着年纪的增大和表现手法的圆熟，总会趋于一种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反约束境界以简御繁以淡见浓的“大匠运斤”式的超技巧状态。正如侍桁译托尔斯泰晚期作品《哈吉·慕拉》序中所言：“他的艺术已经到了烂熟的境界，再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而他也绝不想遵循什么”。第二，“平淡”诗风所表现出的散缓奇趣，淡远情调对于雄奇峻拔，恣肆瑰丽的豪放风格来说，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另一种艺术天地。加上对陶渊明人品的敬慕和自身的生活遭际，使东坡高度评价陶诗，甚至把它置于“李杜”之上，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极境。

《海外集》中所收和陶诗虽未能突破东坡平生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但却标志着他诗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中，许多受平淡诗风影响而创作的好诗如《纵笔三首》《倦夜》《被酒独行》《新居》等等都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成功。就是那些和陶的篇章，也有能摆脱韵脚的束缚，写得极自然别致，富有生活气息的，未可轻视。唱和次韵之风虽不可长，但东坡却好象给我们做了一次“特技表演”，他那高超的驾驭诗歌语言的本领使次韵的束缚倒成了一种令人惊叹叫绝的艺术奇观。如被王文浩称为“杰作”的《和陶劝农》，风韵直攀汉魏，语朴情真，“此但借韵为诗，何暇计及陶语”（王文浩语），并不因次韵而损害自己的独特诗思。又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全诗一气呵成，首尾衔接，意境浑然，看不出半点割裂拼凑，为韵脚所沮的痕迹。整个构思，有内有外，有梦有醒，有动有静，富于变化。其中几个画面交替出现，又利用彼此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这是第一个画面；利用

一个“叩”字，再出现下一个画面：“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因为叩门声惊散了空庭中的鸟雀。又因“空庭”与“门闭”，来一个跳跃，将镜头引入室内，出现特写场面：

“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因为一个“梦”字又生出下句：“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这是说，频频的敲门声使主人从睡梦中惊醒，与“平生友”聚饮晤谈的梦境破散了，心中好不怅然。因梦醒，于是有“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慌忽间，开门延客，连衣裳也穿颠倒了，而心中犹觉得对不起梦中的老友和眼前的陌生客人。因为这一心理，又生出“坐谈杂古今，不管颜愈厚”的话不投机的交谈场面。结果是：“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以一段敷衍搪塞，解嘲打诨的对话了结全篇。东坡在这里象一名出色的导演，利用形象思维，剪接他的镜头，展现了一个精彩的，别有深意的小品。画面是明净洗炼的，形象是简洁生动的，但其内涵并不枯涩浅显，几乎每一句都映带着“海外穷独，人事断绝”，“闭门谢客，深自内省”的主题思想。愈玩味愈觉得其场景生动，寄慨颇深。这正是“外枯而中膏，似瘠而实腴”的平淡风格。应该说，在构思的精巧简炼，又处处体现着形象思维原则方面，古诗中罕有其匹，何况它又是一首次韵诗！

至于和陶以外，好诗亦多。集中除了保持他原有风格的《行琼儋间，肩輿坐睡……》《儋耳》《六月二十夜渡海》《澄迈驿通潮阁》等，受人传诵外，更有“神似杜陵”而品次在“韦、柳”之间的《新居》，“通体俱得少陵神味”的《倦夜》，“纯用本色，毫不依傍古人”的《观棋》等，足可称佳作。黄庭坚称“东坡岭外诗文，读之使人耳目聪明，